

“一带一路”

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研究

“YIDAIYILU”

KUAWENHUA GOUTONG ZHANG'AI YINGDUI TIXI YANJIU

朱 雷 著

非
外
借



海洋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课题成果：
浙江“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研究（编号 16JDGH042）

“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研究

朱 雷 著

海洋出版社

201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研究 / 朱雷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210-0229-4

I. ①—… II. ①朱… III. ①文化交流—研究 IV. ①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0375 号

责任编辑: 赵 武 黄新峰

排 版: 海洋计算机图书输出中心 晓阳

责任印制: 赵麟苏

出版发行: 海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100081

技术支持: (010) 62100052

发 行 部: (010) 62132549 (传真) (010) 62173651
(010) 62100077 (邮购) (010) 68038093

网 址: www.oceanpress.com.cn

承 印: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前言

“丝绸之路”交流源远流长。自汉武帝时期，中国就与丝路国家开始友好交往。经过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中国与丝路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相互交流、互学互鉴提供了重大契机。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将有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实现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思想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藩篱，构筑基于共同背景、共同挑战和共同理想的人类美好家园。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以上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全面协调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交流是应有之义，也是重要的推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相互交流、互学互鉴提供了新的重大契机。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人民的情感、思想和智慧的交流。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根基，文化交流则是民心相通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跨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促进了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会重塑“丝绸之路”历史辉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实施。20世纪，中国与丝路国家各自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复杂的转型，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也曾步入低谷，伴随着中国崛起和全球化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和交流与日俱增。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凸显。中国与沿线

国家在经贸、科技、学术、旅游、民俗、出版传媒、广播影视、饮食等领域,开创了文化交流全面合作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和沿线国家构建互相尊重、广泛交流、深度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合作关系。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双边经贸及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开展。

与沿线国家进行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差异性值得关注。首先文化上的差异性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多样性,是多元文化的内生动力。“丝绸之路”连通世界,四大发明对世界各个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在与丝路沿线国家的长期交往中,中国语言文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而各沿线国家的文化、思想等也对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一些定居中国的丝路国家人民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科技也产生影响,同时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历史上中国与丝路沿线人民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实现民族振兴的努力中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世界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包括中国和丝路沿线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双方多年的共同努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在文化交流领域不断加深。中国与丝路沿线国文化交流领域不断拓宽,内容更加丰富,互动日趋频繁,活动数量大幅增加,涉及范围逐步扩大,活动质量不断提升,层次不断提升,效果更加突出,地位不断攀升。

然而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互通存在障碍,严重影响文化交流。首先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差异较大文化认同度较低。官方交流活动居多,民间文化交流乏力。依靠政府部门推动,双方民间的参与度不高,民间的态度不积极;其次中国和沿线国家人民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受生活习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民众间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也对双方深入开展文化交流造成一定困扰;第三是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渠道,媒体在文化交流方面作用有限,且民众对彼此文化内涵缺乏了解,致使彼此的文化认同陷入困境;第四是由于“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国别研究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导致语言互通不畅,文化误解与冲突时有发生。

解决“一带一路”文化互通问题关键在于形成机制，构建体系，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类资源。该体系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内核。构建文化互通体系首先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互通的意义有深入的了解，要对与文化互通影响深刻的地缘文化、国家语言能力、全球化等关键要素深入分析了解。探讨古今中外应对“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互通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带一路”文化互通体系，以文化互通促进民心相通。

构建“一带一路”跨文化障碍沟通应对体系目的在于真正实现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发展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研究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有利于将各个文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人类文明创新，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之路。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战略意义	1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历史背景	1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当代背景	3
第三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形成过程	6
第四节 “一带一路”倡议对冲“逆全球化”	7
第五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价值	11
第六节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义	14
第二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	16
第一节 全球化的理论解释框架——世界历史理论	16
第二节 全球化的影响与困境	20
第三节 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剖析	28
第四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	32
第五节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新全球化	36
第三章 “一带一路”的实践与再认识	41
第一节 “一带一路”的实践历程	41
第二节 “一带一路”的实施历程	42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实践	43
第四节 “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与前景	49
第五节 地缘经济与政治的重构——“一带一路”再认识	53
第六节 “一带一路”与中国崛起	59
第七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	67
第四章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中的冲突与融合	69
第一节 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带	69
第二节 异质文化的融合案例分析	70
第三节 中国文化特质分析	75

第四节	文化互通与文化自信	80
第五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建设方略	83
第五章	地缘文化与文化互通	86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地缘文化	86
第二节	地缘文化理论概述	89
第三节	“一带一路”地缘文化互通体系	97
第四节	“一带一路”地缘文化互通实体体系构建	111
第六章	国家语言能力与“一带一路”文化互通	118
第一节	语言互通与文化互通	118
第二节	国家语言能力构建	119
第三节	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镜鉴	121
第四节	“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体系构建	124
第七章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概论	130
第一节	文化互通内涵分析	130
第二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与国际舆论塑造	136
第三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的主体对象	139
第四节	“一带一路”的实施对象	142
第五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的战略内涵	143
第六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的目标任务	146
第七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的核心理念	148
第八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的条件	149
第九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的具体实践	151
第十节	国外文化互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154
第十一节	“一带一路”文化互通的国内影响因素	159
第十二节	影响文化互通的国外因素	162
第八章	“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的构建	165
第一节	“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的架构	165
第二节	“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的策略安排	171
第三节	“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障碍应对体系的形式选择	180
第四节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188

第一章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战略意义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同志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宏伟构想和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将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开放引领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古有“丝绸之路”，今有“一带一路”。古代“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连接中国、西亚、中东直到欧洲，同时连接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并将欧洲、中东、西亚的商品输入中国；很快也成为这些国家间进行文化交流，特别是宗教交流的渠道。“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以南海为中心。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三国至隋得到发展，唐宋繁荣，转变于明清，是已知的最早的海上航线。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20世纪，由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专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中首先提出。李希霍芬将中国与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以丝绸为主的商业交通路线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古代骆驼商队所

走的道路统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就是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业之路。1910年，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将“丝绸之路”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丝绸之路”扩展到叙利亚，因为叙利亚是中国主要的丝绸市场之一。赫尔曼的观点得到了西欧汉学家的支持和阐述。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西方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从中国的西北地区,途经中亚、西亚、东欧、中欧,一直到西欧,向南拐向非洲,发现了中国古代与亚、欧、非等友好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以实物证实了丝绸之路的存在。1900年,斯文赫定在新疆发现了楼兰古城,激励大批学者和探险家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美国的亨廷顿、华尔纳,俄国的柯兹洛夫、奥布鲁切,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含义由贸易扩大到经济、文化交流诸多领域。在20世纪40年代,为配合侵华战争,日本政府鼓励本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日本有了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日本人研究“丝绸之路”的目的是为了侵略

战争。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交通线路，还有如“毛皮之路”“草原之路”“瓷器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称呼。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采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才出现于《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一书。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当代背景

一、全球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明显

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出现三次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推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推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展开了两大市场内部的跨国分工与合作，建立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全球性机构，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复苏。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第一阶段截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伴随第三次工业革命，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和贸易迅猛发展。2008年以后世界进入第二阶段。一方面，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国际交流合作前景广阔；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出现逆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另一方面，它 also 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在世界经济繁荣期被掩盖，在世界经济下行期则明显地暴露出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需求的萎缩和增长低迷导致全球存量市场资源进一步收缩。整个世界经济面临新旧周期转换，老的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新的增长周期还没有启动，核心问题则是支撑新周期的新动力没有形成。全球性不平等加剧造成了全球性消费收缩，贸易下降，导致全球总供求总量失衡结构失衡。在经过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在内的“逆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的现象，不仅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受到重创。逆全球化诱发因素有三个：

(1) 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同时,一些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人群在全球化中获得利益较少,从而出现了反分配不公和反财富鸿沟的逆全球化思潮。在现有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分工布局下,全球生产和外包体系已经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人群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较少,出现了反分配不公和反财富鸿沟的逆全球化思潮。

(2) 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发展停滞,是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本原因。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大背景是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以及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新形势,长期以来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开始逐步筑高贸易和投资壁垒,导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横生波折;其国内日益频繁地出现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现象。

(3) 发达国家自身发展出了问题。发达国家把自身的债务危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裂等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整体趋向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成为逆全球化思潮的发源地并波及世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殃及世界各国。全球治理面临“领导力赤字”,谁来继续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成为焦点问题。

逆全球化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分化,不仅发达国家内部,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增长分化的格局;新兴市场国家除了印度和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以外,其他国家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种增长格局的分化,造成全球货币政策难以真正形成所谓的“货币政策集体行动”计划,使得全球经济共同治理面临新的难题,这个问题短期内难以协调。

逆全球化同时引发大国贸易保守主义的“溢出效应”。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采取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行动路线并开始实施;这种大国政策的“溢出效应”对全球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对全球化资源配置方式产生深刻影响。逆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十分有害但却呈现上升趋势的“难题”和“顽疾”。

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全球化中断都会带来经济和民生的倒退。当今世界

经济走不出困境的根源是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旧动力减弱、新动力尚未形成；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同世界经济格局不相适应；全球发展失衡的状况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匹配。逆全球化不可能解决结构性矛盾，只会严重破坏世界自由贸易，侵蚀合作共赢的成果，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逆全球化意味着双输或多输，是短视又得不偿失。

二、国际政治中民粹主义蔓延

逆全球化会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民粹主义导致全球化进程受挫、特朗普上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元加息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投资贸易规则碎片化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难民危机挑战世界经济增长。普遍出现的“眼睛向内”“以我为主”“自我利益至上”，搞“封闭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格格不入，使得世界经济各自封闭。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规律和趋势相反，不利于世界经济长期繁荣和发展。

民粹主义抬头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粹主义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和背景的反映和表象。民粹主义反映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进而产生了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和对社会治理的对抗，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对经济社会现状的不满。而一旦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就会强调自我中心、自我保护，出现反建制、反移民、反精英的情绪，产生对全球化趋势的反抗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民粹主义其背景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其中最大的问题就与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内在联系。几十年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快市场化和城市化迅速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加剧全球不平等问题，美国、欧洲内部均出现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现象，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出现同样问题。全球性收入差距和不平等不仅造成需求收缩也引起社会公平公正缺失。

民粹主义兴起原因还包括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参与率下降引起失业增加，世界经济增长失衡和结构性困境，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资源紧缺、生态恶化、精英腐败、地缘政治危机等，这些问题通过信息化媒介在全球传播，引起世界关注，促使民粹主义思潮抬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

和不平等扩大所致，需要从全球不平等加剧视角认识和理解。民粹主义极容易在表面上迷惑人心，快速传播，后果很严重。

第三节 “一带一路” 倡议的形成过程

2011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政府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源于弗雷德·斯塔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和建议。他构想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西亚国家与印度，乃至东南亚、东亚连接起来，促进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以上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弗雷德·斯塔教授的“新丝绸之路”主要限于亚洲地区经济建设。美国政府将弗雷德·斯塔教授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谋求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与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相配合。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的需要。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目的是为了全球经济发展、贸易发展和文化交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2013年9月17日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斯塔教授表示，“一带一路”构想与他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推进，而且可以合作互补。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由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并主导建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成为中国未来长期国际战略。我国发展正从“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转变。习近平同志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拓展改革发展新空间》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包容性巨大的合作发展平台，把中国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放实践。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步入主动引领全球化的新开放时代。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纳入相关内容。经贸合作扎实推进，2014—2016年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初具规模，互联互通项目规划实施，各领域人文合作深入开展。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新平台。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新实践。

第四节 “一带一路”倡议对冲“逆全球化”

一、“一带一路”是全球化十字路口的方向标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正呼唤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这就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起点。当前世界矛盾交织、冲突频发、不确定性上升。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全球范围生产力和治理体系滞后的矛盾产物。

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已有四十年历史。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以及由于矛盾积聚而产生新动能的力度，都是空前的。一方面，全球生产力大发展，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科技革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新兴经济体进入世界市场体系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在全球财富集中导致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失控、宏观调控失灵、公共品严重短缺，全球治理机制跟不上全球化步伐的问题凸显。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经济大发展，40年问题大积累。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矛盾运动的两重性，在大国战略选择中，呈现出两条不同路线：一条是逆全球化路线，一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把经济全球化经由一个过渡期而推向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路线。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困境，实质上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发展长期停滞，内外政策不思进取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企图从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去寻找政策工具，从意识形态对抗、军事遏制战略中寻找出路，只能是

走向绝路。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所指出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面对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指出：“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正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倡导一条促进而不是促退、开放而不是封闭、包容而不是排外的全球化路线。主张要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通过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结合，通过全球治理优化和经济政治秩序的改革，来深化利益交汇点，构建全方位利益共同体，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条件

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呈现发达经济体矛盾激化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的新现象。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启动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将在 21 世纪第四个 10 年的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进程中，打开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广阔的道路。“一带一路”已经获得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参与。发展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支点，而发达国家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这个趋势。

“一带一路”的历史作用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结纽带；二是引导全球资金向实体经济方向流动；三是促进全球产业链和科技生产力的均衡化，促进世界经济由严重失衡转变为相对平衡。

“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就是通过长周期，通过新动能，大变动，并且通过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新协调，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步迈向海陆经济全面打通的全球化。

三、“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根本历史特点，就中国国内而言，标志着中国的东中西部经济联动发展；就世界而言，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将由海洋经济

全球化，大步迈向海陆经济全面打通的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是海洋经济的全球化。目前内陆经济将在打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以巨大体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主体。“一带一路”整合了集装箱海运、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运、互联网、现代网络金融产品等各类工具，全方位打通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从而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历史特点。

“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带动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跃升。过去四十年，中国在对外开放，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很大。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给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市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本质是“合作”，是利益交汇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顺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而提出的“合作共建”战略构想。中国40年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证明，一定要把事情建立在我们自己力量不断加强的基点上，一定要坚持同国际范围相关各方长期合作的清醒方针。在此基础上，以“五通”为特点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能够为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强劲动力。

中国正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贡献者和引领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渠道。它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推动均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为全球化打开新局面。

“一带一路”建设应秉持的核心理念：合作共赢。它植根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合作共赢是其最鲜明的特色。它提出了“三个共同体”的新意识，即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共同体”的新意识植根于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契合世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它提出了“五通”实施路